

Research Article

<https://doi.org/10.70731/ykp3hz77>

Divergent Paths: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University Legacy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同途殊运：司徒雷登和卜舫济的治校方略与大学命运

Jiajie Wang ^{a,*}

^a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Keywords:

John Leighton Stuart;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Yenching University;
St. John's Universit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Localization

关键词：

司徒雷登；卜舫济；
 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
 治校理念；本土化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to elucidate the divergent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t. John's Univers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t argues that Stuart's commitment to "Sino-Western integration" and proactive "localization" fostered a sense of Chinese ownership at Yenching, thereby enhancing its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In contrast, Pott's adherence to a "Western-oriented," elitist model, while successful in cultivating talents, entrenched St. John's in cultural alienation and identity crises amidst profou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due to its insistence on Western cultural primacy and administrative control. Ultimately, their contrasting visions not only shaped the distinct developmental paths and cultural legacies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but also underscored the decisive impact of strategic choices made by educational leaders on institutional sustainability during non-Western modernization.

摘要：本文以司徒雷登与卜舫济的治校理念与教育思想为比较视角，深入剖析了燕京大学与圣约翰大学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迥异命运。文章指出，司徒雷登秉持“中西融合”与“本土化”策略，通过权力让渡与文化尊重视燕京为中国自有之机构，从而增强了其社会适应性及历史生命力；相反，卜舫济推行“西方导向”与“精英化”方针，虽在人才输出上成就卓著，然其固守西方文化本位及管理权威的立场，致使圣约翰大学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陷入文化隔阂与身份认同危机。最终，两种不同的理念不仅塑造了两所大学独特的发展路径与文化遗产，更深刻揭示了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领导者的战略抉择及其对制度存续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引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波澜壮阔，其间政治制度嬗变、经济结构转型、社会形态革新与文化思潮激荡相互交织，构成一幅复杂多元的历史图景。在此宏大背景下，教育作为知识传播、价值塑造与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不仅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使命，更在形塑民族认同与

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在众多教育机构中，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与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尤具代表性。这两所基督教大学虽同以融贯中西为办学宗旨，却因执掌者理念之异而形成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keiln0@163.com

Received 30 September 2025; Received in revised from 19 November 2025; Accepted 22 November 2025;
 Available online 30 November 2025.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Submitted for open access publication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主持燕京大学期间，着力推动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将基督教精神与中国传统智慧相结合，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国际化办学模式。而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领导下的圣约翰大学，则更注重西式精英教育的移植，以英语教学与基督教传播为核心，虽成就卓著，然亦面临与中国社会融合的挑战。这两所大学的办学历程，折射出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面相：既是西方知识体系与教育模式传播的媒介，又不可避免地卷入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的张力之中。

本文通过系统比较司徒雷登与卜舫济的教育理念、治校方略及其对时代变革的回应，探究二者如何塑造各自大学的发展路径与历史命运。尽管两校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中殊途同归，共同融入新中国教育体系，但其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思考当下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平衡文化传承与国际对话、民族认同与全球视野等议题，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背景

本章旨在为比较司徒雷登与卜舫济的教育理念提供必要的历史语境。通过追溯两位校长的生平轨迹及其所创办大学的办学历程，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与历史作用。这些学府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既推动了现代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的挑战。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创办历程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作为近代中国教育史与外交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其一生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连，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桥梁。1876年6月，他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庭。父亲约翰·林顿·斯图尔特与母亲玛丽·霍顿·斯图尔特早在1868年便来到中国，在杭州从事传教事业。其母创办的杭州女子学校，对推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贡献卓著。

尽管拥有美国国籍，司徒雷登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多在中国度过，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自认“更像中国人”。十一岁时返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汉普登-悉尼学院预科及里士满神学院。这段特殊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他独特的双文化视角，最终促使他追随父母足迹，选择以传教士教育家的身份回到中国。

1904年，司徒雷登与艾琳·罗德在新奥尔良成婚后共同返华。他先后参与创办之江大学，并在南京金陵神学

院担任新约文学教授，期间编纂出版《新约希腊文中文要点》与《新约希腊汉英词典》等学术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传教工作曾得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支持，这段经历为其日后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

1919年，司徒雷登受命组建燕京大学。面对由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及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等多所教会学校合并办学的复杂局面，他展现出卓越的整合才能。在任校长的二十余年间，他将燕京大学建设成为中国最杰出的高等学府之一。其办学特色鲜明：在校区建设中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未名湖、博雅塔等景观至今仍是北大校园的重要标志；在办学理念上强调“燕京应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注重本土化发展。

司徒雷登积极推动国际合作，1928年促成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并与普林斯顿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密苏里大学等知名学府建立合作关系，引进新闻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也为人称道，据作家冰心回忆，他能叫出校内每位师生的姓名，包括工友与清洁人员。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直至1949年离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各系科分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1962年他在华盛顿逝世，所著《在华五十年》成为研究近代中美关系的重要文献。其历史评价颇具复杂性：在中国一度被视为帝国主义象征，在西方则被推崇为文化交流的先驱。

卜舫济与圣约翰大学的发展轨迹

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作为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教育家，以其近半个世纪执掌圣约翰大学的经历而闻名。1864年2月出生于纽约一个圣公会牧师家庭，188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1886年于纽约通用神学院完成神学训练。1888年被按立为牧师后，即赴上海圣约翰学院任教。

圣约翰学院由美国圣公会于1879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式大学之一。卜舫济到任后很快展现管理才能，同年即被任命为院长。在他的领导下，学校于1896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成为中国首所授予学士学位的现代大学。其办学成就显著，培养出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贝聿铭等杰出校友。

1890年，卜舫济与中国圣公会牧师黄光彩之女黄素娥成婚。黄素娥本人也是著名教育家，曾任上海圣玛丽亚书院校长。这段婚姻进一步加深了卜舫济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在学术方面，他致力于语言与历史研究，出版

《上海话课本》、《中国史纲要》等多部著作，显示出对本土文化的深入理解。

除了教育事务，卜舫济还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活动，曾任中华教育会主席、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会长等职。他倡导以科学技术、民主理念与基督教价值观为核心的西式现代化道路，但在处理与中国社会关系上持相对保守立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卜舫济离开上海返回美国。1946年虽重返中国，但于次年3月逝世，骨灰安葬于圣约翰大学校园。1952年院校调整中，圣约翰大学解散，其教育资源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等机构。卜舫济的教育遗产具有双重性：既成功建立了中国精英教育的典范，又因文化立场的保守性而引发争议。

教育理念

司徒雷登与卜舫济的教育理念植根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取向，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鲜明的差异性。作为基督教高等教育的重要实践者，二人皆致力于通过教育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却在具体路径上各具特色：司徒雷登注重中西文化的融合与本土化实践，而卜舫济则更倾向于西方模式的移植与精英化培养。这两种取向不仅塑造了燕京大学与圣约翰大学迥异的办学风格，也折射出基督教大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特殊处境——既是现代知识传播的媒介，又是文化调适的场域。

司徒雷登的教育理念：中西融合与本土化

司徒雷登的教育思想形成于其独特的跨文化经历。出生于传教士家庭，深受自由神学影响，又兼具中美双重文化背景，使他形成了以基督教原则为基础、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观。他主张寻求中西文化元素的和谐共生，着力在学生中培养宽容精神、协作意识与服务理念。

在办学实践中，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定位为促进中国国家建设与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致力于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面对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他坚持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确立为校训，强调“学校若无学术自由即不成其为大学”的办学理念。

司徒雷登创新性地构建了“才、德、体、力”四维育人模式，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能够担当国家建设重任的领袖人才。在“才”的方面，通过智力测试等科学方法选拔优秀生源，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确保教育质量；在“德”的方面，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元素与人格塑造，强

调“除去职业训练外，还要注意人格的培养”；在“体”的方面，汲取基督教责任观与洛克教育思想，重视体育对学生身心发展的价值；在“力”的方面，强调知行合一，通过清河实验区等社会实践项目，将知识服务于社会改良。

在课程设置上，司徒雷登注重世俗实用知识的传授，推动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的结合。他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通过哈佛燕京学社等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中国学术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这种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教育理念，体现了外部视角下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独特路径。

卜舫济的教育理念：西方导向与精英化

卜舫济的教育理念则体现出鲜明的西方中心取向。作为圣约翰大学的核心缔造者，他致力于创建一所现代化、高效率的高等学府，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同时注重道德教化与公民素养的培养。他将圣约翰定位为“中国的西点军校”，旨在培养能够引领社会变革的精英人才。

卜舫济坚持小规模、高质量的办学原则，强调“较小的学校，保证质量，而不求数量”，认为精英群体如同发酵的力量，能够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即使在1930年代入学需求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他仍坚持严格筛选学生，注重基督教品质与健全智力的双重标准。在其主持校政期间，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总数约六千五百人，年均不足百人，充分体现了其精英化办学特色。

在教学内容上，卜舫济大力推行英语教育，视其为传播基督教理念与西方文明的重要媒介。自1890年代起，圣约翰大学逐步确立英语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除国文课程外，各学科均采用英文教材与英语授课。这一举措既是为了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接轨，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在行政管理方面，卜舫济展现出精打细算、注重效率的特点。通过精简行政机构、控制经费支出等措施，确保学校资源的高效利用。1894至1929年间，圣约翰大学行政经费常年维持在总支出的百分之四以下，体现了其严谨务实的管理风格。

理念比较与深层分析

两位教育家在管理风格上确有相通之处，皆以严谨治校、关怀师生著称。司徒雷登捐资设立奖学金，完善助学体系；卜舫济严格控制行政开支，提升办学效益。然而，在文化立场与教育取向上，二人展现出根本性差异。

司徒雷登的本土化策略使其教育实践更具适应性。他推行的四维育人模式与中国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课程设

置兼顾中西学问，通过社会实践促进知识向社会的转化。相比之下，卜舫济的西方导向虽在精英培养上成效显著，却因忽视本土文化语境而引发文化冲突。其强调英语教学与基督教传播的做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日益受到质疑。

这种差异深植于二人的个人经历与文化认同。司徒雷登的中国出生背景使其对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理解与尊重；而卜舫济的美国教育背景则强化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最终，燕京大学因其包容性而广纳中国学者，圣约翰大学则因文化立场的保守而渐生局限。

若引入当时广为流行的杜威教育理论作为参照，即可见司徒雷登的教育理念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多有契合。二者均强调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与实践导向，司徒雷登的四维模式中的“力”的维度与杜威“从做中学”的理念尤为接近。而卜舫济的精英化教育则更近于传统的知识传授模式，与杜威倡导的经验重构与民主参与存在相当距离。

这一比较揭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理念的选择关乎文化适应与创新。司徒雷登的中西融合路径因其对本土文化的尊重与创造性转化，而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卜舫济的西方移植模式虽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过积极作用，却因忽视文化调适而面临更大挑战。基督教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教育的现代化并非简单的模式移植，而是需要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对话中寻求创新与突破。

二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

司徒雷登与卜舫济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承担的角色，深刻反映了二人不同的文化立场与实践取向。这些差异既源于其个人经历与价值理念，也体现出基督教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所承载的特殊使命：既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推动中国知识界的现代转型；又不可避免地面临本土化诉求与外来文化植入之间的深刻矛盾。

通过系统比较可见，司徒雷登始终以桥梁与建设者自任，注重文化融合与本土适应；而卜舫济则秉持推动者之志，虽在人才培育方面卓有建树，其西方本位立场却屡屡引发文化冲突。这一对比不仅展现二位教育家在策略选择上的分野，更揭示了现代化进程的多元本质——它并非单一模式的移植，而是在不同文化力量相互激荡中形成的复杂图景。

司徒雷登的角色：桥梁与建设者

司徒雷登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始终秉持桥梁与建设者之使命，既深耕教育，亦涉足政，致力于中西文明

之沟通与融合。作为燕京大学创校校长，他不仅引入西方高等教育之精粹，更着力促成中华文化之对外传播，构筑起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文明对话平台。

其教育实践尤见开拓之功：在司徒雷登主持下，燕京大学先后设立中国首个社会学系（与普林斯顿大学合作）、首个新闻学系（与密苏里大学合作），并得韦尔斯利学院之助，大力推进女子教育。这些创举不仅拓展了中国学人的知识疆域，更在校园中培育出深厚的国际主义气质。正如司徒雷登所言，此类合作“或可于校园中涵养国际主义氛围，使学子于潜移默化间生成世界眼光”。其后哈佛燕京学社之成立，更成中西学术交流之典范，既促进美国汉学研究之制度化，亦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司徒雷登的建设者本色，尤见于其对本土社会之关切。他始终将燕京大学视为“中国之有机组成”，而非外来移植之机构。通过创办清河实验区等举措，使学术知识得以转化为切实的社会服务，彰显教育机构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之延伸功能。此种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办学理念，使燕京大学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独树一帜。

然其角色在后期的政治参与中愈显复杂。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司徒雷登深陷国共纷争之漩涡，仍尝试与中共建立对话渠道。虽其努力终未奏效——如1949年3月电报中所流露对时局之忧虑——然此等尝试恰体现其中介者之定位。在《在华五十年》回忆录中，他深刻反思自身从“自由主义对华亲善代表”至“帝国主义代理人”之形象转变，此一自白正揭示了跨文化桥梁构建者所必然面对的身份困境。

要而论之，司徒雷登之历史贡献，在于构建了一套中西文明交流的可持续框架，使现代教育理念与社会改革经验得以系统性地植根于中国土壤。其办学遗产，至今仍为中外教育交流提供重要参照。

卜舫济的角色：推动者与争议者

与司徒雷登所采取的融合路径不同，卜舫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更多展现出专注而坚定的推动者姿态，然其作为亦伴随着显著争议。执掌圣约翰大学期间，他着力拓展校务体系，培养出顾维钧、宋子文、贝聿铭等一批深刻影响近代中国进程的杰出人才。在其主持下，圣约翰不仅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声，更通过注重科学技术与基督教价值观的融合，推动了一种以西方为范本的现代化模式。此种推动作用亦体现在文化传播层面：大学设于上海这一通商大埠，与城市发展互为表里，将基督教精神与现代教育理念逐步辐射至内陆地区。卜舫济所著《中国史纲要》等作品，更为西方世界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然而，卜舫济以西方为中心的办学理念逐渐引发本土社会的质疑，使其角色由推动者转为争议者。与司徒雷登辅弼中国教育的立场相异，他将圣约翰视为西方文明在中国拓展的前沿，着力通过英语教学与基督教传播主导教育实践。这一取向在二十世纪初的非基督教运动与收回教育权风潮中尤为显著：卜舫济以强硬姿态应对社会变革浪潮，使圣约翰成为教会权威的象征。五四运动期间，校方压制学生爱国行动，更有美籍教师宣称“此校系美人设立，华人在此无自由权”，终致罢课与开除事件频发。

1925年的“六三国旗事件”更将中西对立推向高潮。当时，五卅惨案激起全国愤慨，圣约翰学生于六月三日在校园升起半旗志哀。卜舫济闻讯赶至，不仅夺旗掷地，更当众践踏，随即宣布提前放假，勒令学生离校。此举引发五百五十三名学生集体退学，多数华籍教师亦联袂去职。离校师生在社会各界支持下，于同年九月创立光华大学，取“日月光华”之义，自立民族教育之基。

此类事件虽属偶发，实为长期文化冲突的必然显现。卜舫济因而成为颇具矛盾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以教育推动者之姿，为中国现代化输送诸多栋梁；另一方面又以文化权威自居，使圣约翰渐成疏离中国社会的教育飞地。其在1947年溘然长逝，未及得见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然其办学遗产至今仍为学界留有丰富讨论与深刻反思的空间。

比较分析

司徒雷登与卜舫济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皆致力于沟通中西文明，然二者所循路径迥异，成效亦殊。司徒雷登以积极融合之姿，借国际合作与本土实践拓展学府影响力；卜舫济则持守成之势，虽造就英才，然其宣教为本之立场终致文化扞格，使学府渐疏于中国社会之本源。

观其长久成效，司徒雷登所立之基更为稳固。其倡建哈佛燕京学社，不惟成就中美学术往还之津梁，更形成文化浸润之良效。反观卜舫济治下之圣约翰，独尊英语与西教，此种教化方式颇招“文化侵凌”之议。每遇学潮激荡，司徒雷登以圆融处置保全燕京元气；卜舫济则因执守既定之规，致使学府根基动摇。

二者命运殊途，实源于治校理念之异：司徒雷登以本土化为滋养，使学府得以在中国土壤中生根滋长；卜舫济因循旧制，不期然间筑就文化藩篱。即如在体育教化方面，圣约翰专务西方体育之传授，燕京则求人格全面之养成。

要而论之，司徒雷登之作为促成中西文明之交融互益，卜舫济虽开教育现代化之先声，然其固守之态亦局限其影响之广度。此一比较，既见二人抉择之得失，亦

显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殊之处境与历史轨迹。

启示与教训

燕京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的办学历程及其两位校长的历史实践，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深刻的启示。这些经验不仅关乎教育领导者的个人抉择，更触及现代化路径的本质特征、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以及全球对话中的权力伦理。

首先，领导者的个人因素在制度演进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在相似的时代背景、相同的教会渊源与相近的资源条件下，两所大学的迥异命运主要源于校长意志、文化视野与战略选择的差异。司徒雷登凭借其双文化背景，以开放姿态顺应民族主义潮流，通过权力让渡使燕京大学成为“中国自己的大学”；而卜舫济则固守西方主导模式，将本土化诉求视为威胁，致使圣约翰大学在“六三事件”后日渐边缘。这段历史表明，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度存续的关键不在于资源多寡，而在于领导者能否超越自身文化局限，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抉择。

其次，现代化绝非简单的西方化过程，而是文化再生与权力重构的复杂博弈。司徒雷登的卓见在于将西方高等教育制度转化为“中国化的西方范式”，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清河实验区等实践，实现了知识创新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卜舫济的局限则在于将西方制度视为不可变通的模板，以英语教学与宗教标准构筑文化壁垒，拒绝本土知识分子的深度参与。二者对比可见，真正的现代化并非文化替代，而是文化交融与权力共享的进程。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以其完整的校园底蕴融入北京大学，而圣约翰大学则遭彻底解散，这正是历史对两种现代化策略的最终评判。

第三，教育作为精神培育与身份形塑的重要场域，其核心在于尊重主体尊严、构建文化认同。司徒雷登确立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校训，不仅体现教育理念，更是一种伦理担当——对中国主体性的充分尊重。燕京大学的中式建筑、汉学传承与中国教授治校模式，共同构筑了“我们亦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圣约翰大学的英语主导、西人行政垄断及“六三事件”中的国旗风波，则持续伤害民族情感，形成“华人无自由”的集体记忆。当教育机构无法回应文化认同这一根本诉求时，任何学术成就都难以抵御时代浪潮的冲击。

最后，全球化时代的文明交流必须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司徒雷登与哈佛大学的合作并非单向的知识输送，而是双向的学术共创——哈佛获得汉学资源，燕京建立现代学科体系；而卜舫济推行的英语教学则被视为

“文化殖民的最后堡垒”。在当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成功的国际教育合作不应是“西点军校”式的精英复制，而应借鉴燕京-哈佛模式的互惠共赢。

综上所述，司徒雷登与卜舫济同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教育家，却因理念差异而走向不同结局：前者致力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与主动调适，后者坚持西方导向的精英培养与控制模式。二者的历史轨迹充分证明：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任何拒绝本土化、排斥权力共享的教育制度终将被时代淘汰；唯有将外来知识转化为本土主体性建构的机构，方能在社会变革中获得新生。两所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的“同途殊运”，并非偶然的历史结局，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对教会大学作出的最终裁决：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工具，更是关乎文化认同、民族尊严与全球正义的重要领域。

References

1. West, Philip.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DOI: 10.4159/harvard.9780674863064
2. Lutz, Jessie Gregory.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3. Xu, Yihua (徐以骅). *Shanghai St. John's University, 1879–1952* (上海圣约翰大学, 1879–1952).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ISBN: 9787208085084
4. 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no. 14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0. ISBN: 9780674015852
5. Bays, Daniel H.,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DOI: 10.1515/9780804765612
6. Stuart, John Leighton.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ISBN: 9781406705294
7. Lamberton, Mary.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8. Bays, Daniel H., and Ellen Widmer, eds.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1900–195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OI: 10.1515/9780804776325
9. Fan, Shuhua.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Cultural Engineering: Remaking the Humanities in China, 1924–1951*.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ISBN: 9780739168509